

与收音机相伴的日子

我出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甘肃省临泽县。那时,农村文化生活单调,收音机就是当时最高档的电器了。

我们村有一户较富裕的家庭最早拥有收音机。只要每天有节目,他家收音机的音量就开到最大,半个村子的人都能听见。如果播出村民们爱听的地方戏,他家还将收音机摆放到门口的桌子上,村民们围拢在一起,听得津津有味。

记得那时有个评书节目,由刘兰芳和袁阔成分别演播的《岳飞传》和《杨家将》,非常生动精彩。由于我经常去听收音机,有一年腊月的一天,这家主

人跟我说:“你爱听收音机,快过年了,我家准备买个大的,这小的便宜卖给你,5 块钱。”

那时,5 块钱可不是小数目,父母不同意,我就说:“过年的新衣服我不做了,省下钱买收音机。”于是,十几岁的我拥有了一台“二手”收音机。

自从有了收音机,我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。每天放学一回家,我就抱着收音机听,空闲时间帮家里干农活时,将收音机带在身边,晚上睡着了,收音机还在响。那时候广播节目比较少,主要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电台,外省电台偶尔也有,可信号弱,杂音大,但不管

什么节目我都爱收听。

中央台的《新闻与报纸摘要》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》,省台的新闻节目,我一个都不落下。受此影响,从上初中开始,我就学写各类新闻稿件,投给报刊和电台,担任过全国多家媒体的通讯员。

1979 年的一天晚上,15 岁的我在收听《对农村广播》节目时,山东新研制的一项小麦新品种颗粒重、抗倒伏、产量稳,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们那儿是小麦产区,由于雨水多,刮风多,小麦倒伏现象非常严重,小麦产量低。在收听广播后的第二天,我就按地址给山东的相关部门

写了一封信,并用平时攒下的压岁钱购买了几公斤良种试验。结果,这个新品种小麦不仅籽粒饱满、颗粒重、不倒伏,产量还高于本地原先播种的小麦 15%左右,第二年这个新品种就在我们当地开始推广。此事影响了我一生,我后来上的大学是农大,学的专业是农经……

30 多年来,我听坏了 5 台收音机,不论在家还是出差,我都怀揣小收音机,每天再忙,也要抽时间听。如果说只留一个物件伴我一生,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收音机,因为它既不会落伍,也能让我怀念那难忘的蹉跎岁月。

汪志/文

■朝花夕拾■

接生

过去,农村妇女生孩子,都是请本村的接生婆按照老传统把孩子接下来。这种方法不科学、不卫生,大人得病的多,孩子成活率也低。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很重视生育问题。县卫生局举办了接生员培训班,由各村挑选 40 岁左右、干净利落、人缘好、热心肠的妇女去参加培训。我母亲被选中了,她高高兴兴地到县里培训,回来就承担了村里的接生工作。

母亲对接生很重视,不管白天黑夜,有人来叫马上穿戴好就走,她常说:“人家孩子大人的命就攥在我手上了!”很快,母亲就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。有的孕妇男人不在家,母亲便拿上两个鸡蛋到孕妇家,每天与孕妇做伴,直到孩子安全降生,母子平安,母亲才放心地回家。

由于母亲的口碑好,附近十里八乡的孕妇也来请她。那时没有交通工具,不管白天夜间、寒冬腊月,母亲都是步行去。县医院的阎桂荣医生和杨德华医生有时也请母亲一同去处理难产、棘手的病例。如今,我们村五六十岁的乡亲见到我就会说:“我是大娘把我接来的,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呀!”

母亲虽然离开我 50 多年了,然而,她的笑容会经常呈现在我的眼前。

王晓甦/文

儿时看小人书

上世纪 60 年代末,由于物资匮乏,农家孩子能够开阔眼界的课外书籍,只有小人书。

小人书又称连环画,内容大多是由当时流行的电影、小说以及戏曲的精华部分改编而来,其语言简洁且通俗易懂,深受孩子们的喜爱。

记得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我的同桌张近昌将小人书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带到教室里向同学们炫耀。看到小人书,同学们都很激动,纷纷向他借阅。为了读到那本小人书,我答应替他做三个值日——打扫班级卫生,他才借给了我。那本小人书是我今生看过的第一本小人书。

看过那本小人书后,我的阅读兴趣被激发出来,天天想着能够再读一本小人书。离我们学校不远处有个供销社,里面有一个柜台摆着小人书。那时,最贵的小人书也就二毛二分钱,最便宜的仅七分钱。尽管小人书很便宜,但对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,那价钱也是高不可攀。

小学二年级暑假,我和小伙伴们到田沟、地畔挖药材卖钱,一个暑假下来,我竟然卖了两块三毛八分钱。我向父母上交了两块一毛钱,用剩余的二毛八分钱买了两本小人书,一本是《小英雄雨来》,一本是《东郭先生和

狼》。有了这两本小人书,我便有了和同学交换看小人书的资本。那一年,我阅读了《草原英雄小妹妹》《烈火金刚》《地雷战》《鸡毛信》等十几本小人书。

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我发现农村的集市上竟然有摆小人书的地摊。摆小人书地摊的一般都是从城里来的老人,戴一副眼镜,看起来很有文化。地摊上的小人书可不是卖的,而是收费阅读的,读一本收二毛钱。虽然那些小人书已经很旧了,但书摊前却坐满了阅读的孩子,来晚了,连坐的小凳子都没了,只能蹲在地上看。

后来,我迷上看小人书的

事被父母发现了,在父母眼里,那可是不务正业,会影响学习成绩,影响做家务、干农活,而且还要花钱,是必须禁止的。于是,父亲便时不时地搜查我的书包和房间,看有没有小人书。一旦发现小人书,挨打是少不了的,而且小人书还要被烧毁。有一次,父亲从我的书包里搜到一本小人书,一把就丢在燃烧的炉膛中,看着小人书化为灰烬,我哭得撕心裂肺。

如今,时光流转,小人书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,但小人书带给我的那份纯真和快乐,却永远留在心底。

杨进峰/文

■图说往事■

参加抗美援朝



1953 年 10 月,16 岁的我从四川省荣县参军到部队,同月,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,奔赴抗美援朝战场。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,我不怕条件艰苦,机智勇敢,英勇杀敌,荣立一次三等功。1956 年 10 月,我回到祖国。图为参战期间,我在简陋的宿舍前拍的照片。

范宗林/口述并供图 李朝云/整理

一场“国际足球友谊赛”

1983 年“五一”前,我和同事因公出差去大连。我们在当时位于塘沽的天津新港,要买船票坐轮船去大连。买好船票后,需要等六七个小时才能开船。时间还早,我们检票进了港口,坐在港口和海岸边的一大片沙滩上,欣赏着海天一色的景色。

我们看到几个年轻的港口工人拿着足球,来到这片空旷的沙滩上,画地为场地,踢起了足球。几个人的盘带、过人、射门都是一气呵成,不亚于一个专业球队。

这时,从港口边停着的一艘外轮上,下来几个年轻的外国船员,他们也来到临时沙滩足球赛场的边上,饶有兴致地观看踢球。忽然,我看见一个外国船员利用中国工人捡球的空隙,向沙滩上站着的几个球员走去,比画说着什么,然后,一个港口工人向我走来。他来到我面前打了声招呼,说那几个老外想和他们踢一会儿足球。他们那边两个岁数大的中年工人,一个当临时裁判,另一个岁数大的中年工人

就推荐我上场。就这样,我和 4 名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临时组成了中国沙滩足球队,同 5 名外国船员开始了 5 人沙滩业余足球友谊赛。

这次比赛踢得很激烈,外国船员踢得很卖力,我在沙滩上使劲开大脚往海边踢球,他们拼命地追赶,不舍不弃。我方队长提醒我:“虽然这个临时足球场没有边线,但最好不要这样。”我们大家都跑得气喘吁吁,最后在结束这场 40 多分钟的友谊赛后,大家一起互相握手道别。其中一个老外和我握手时,还用汉语问我:“你,是中国人吗?”我点了点头。他笑呵呵地伸出大拇指,给了我一个大大的赞。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